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丛书·情报学

敝屣集



杨教

吉林出版社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丛书·情报学

敝 屣 集

杨 教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思敬

封面设计：周剑峰

敝 履 集

杨 敦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钦州南路8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5 1/32 印张 16.5 插页 4 字数 380,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80646-238-9/G·45

定价 25.00 元

作者简介

杨教，男，1934年生，湖北洪湖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是个童工，解放后于1950年1月在四川参加革命当排字工人，后做新闻记者。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次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开始做资料编辑工作。1979年平反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编辑部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83年经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通过评审为副编审。1983年秋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任情报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93年晋升研究员。1986年起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编辑委员、学术委员和常务理事。

本书提要

本书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丛书之一，也是国内社会科学情报界第一本个人学术论文选集。全书分三部分：《实践篇》论述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实际问题，包括从宏观体制到微观管理等；《辩论篇》讨论的是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发展前沿地带出现的有争议的热门话题；《探索篇》则研究了社会科学情报理论建设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本书作者有长期从事社会科学情报实践的丰富经验，因而所撰论文均非架空的理论设计和对已知情报知识的转述，而是根据中国实际探索情报理论建设的产物。所选论文在国内社会科学情报界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发展的艰苦历程，是一本可供高校图书情报专业师生、图书情报工作者和图书情报理论研究者参考的读物。

情报学研究中的人品和文品

——为杨教同志《敝屣集》作序

易克信

在我国社科情报界为数不多的“两栖”人员中，杨教同志堪称佼佼者。所谓“两栖”人员是指那些在情报工作实践和情报理论研究两个方面都有所建树的人士。杨教同志从事情报资料工作三十多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成果颇丰；从事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迄今也已15个春秋，其理论著述可谓多产，且质量上乘者不少，此点已为社科情报界所公认。因此当我得悉他所在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决定为他结集出版情报学论文选时（附带说一句，杨教同志一向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为他出专集的动议以前曾多次提出，但他本人一再婉拒，这次他之所以终于同意出个集子，只是出于留点“历史痕迹”的考虑），我认为此举甚是得宜，而这一在国内社科情报界的创举由杨教同志首开其端也是理所当然的。

杨教同志以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从事社会科学情报资料工作，较之从其他专业转行而来的同志有多方面的优势。他思路开阔，嗅觉敏锐，笔力雄健，善于抓住热点问题跟踪探索。更由于他勤于钻研，勇于进取，他在情报学理论研究中多有创见，著述颇具理论深度。

我与杨教同志结识十多年，其间两度共事于同一研究课题，

多次一起参加工作会议和学术研讨，因此对他的为人和学识均有深入了解。我敬重他的人品与文品，我知道，他不但在情报学理论研究方面造诣较深，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有成就，既发表有中、短篇小说多篇，也常有杂文、随笔推出。他每有新作问世，必惠寄与我，我也每以先睹为快的心情认真拜读。每读他的理论文章或文学作品，我心中都产生强烈共鸣，思想上都有所收益，也由此逐渐形成了对他理论著述特点的一些认识。

文如其人，有什么样的人品，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品。目前我国学界少数人文风不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些人的如何做人问题没有正确解决相关联的。杨教同志力求为人正为文也正，他做人真诚，做学问也真诚。他为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做文章不投机取巧，不哗众取宠。在我看来，他理论著述的首要特点是不趋时媚俗、随风转舵。凡是认准了要探究的问题，必定要穷追不舍地弄个明白，决无不懂装懂的陋习。他所提出的见解都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反复研究的结果，从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正因为此，他对自己深入思考、多方论证后提出的观点，往往刻意坚持，不轻易改变。这并非抱残守阙，而是理论探索的执着，得来不易的东西决不随便放弃。杨教同志并非社科情报专业出身，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有关专业知识，对此他有自知之明，力求通过研究中的苦读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在理论探讨中肯于学习也善于学习；抓住一个问题进行研究时，总是先认真阅读前人和今人的有关论著，对于从国外引进的某些新潮理论也不排斥，在认真研读，对比参照一番以后才审慎地提出自己的论断。例如，他关于社会科学信息交流的模式、形态和类型的分析和论述，就鲜明地表现他这种独立思考、不落他人窠臼的创新精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每当社会上刮起迎合某种时尚的劲风，而这股劲风又波及学界的时候，杨教同志总是以“冷眼向

洋”的镇静态度辨别风向，不盲目地随波逐流，仍然镇定自若地以科学态度从事自己的研究，对随风而来的各种时髦观点认真分析，作出自己的回应。如在前些年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大情报观”的氛围中，他就始终不为所动，坚持科学情报部门应以搞好本职工作为出发点参与社会机体运转的观点，尽管为此被指责为“小情报观”的代表人物而似乎陷于孤立也仍然不改初衷。他这种理论探讨的执着精神是他为人真诚的表现。

与上述不随流俗的精神相伴随的他为文的另一特点是，他往往通过争鸣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见解。对自己认为值得商榷的观点，他往往提出异议从而导致学术争论，在所谓大小情报观之争、社科情报产品商品化之争以及最近开展的关于信息产业的争论中，他都是参与辩论的一方主将，有的争论还正是由他所挑起。他也因此而落得个“好斗的公鸡”的雅号。表面上看，杨教同志似乎对学术论争乐此不疲，其实，正是因为他治学态度严谨执着，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所以对理论混乱所导致的思想困惑力求予以澄清，这是他参与争鸣的一个出发点。再者，他一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认为理论的正确与否对实践的影响至为深远，我国社科情报事业起步晚，基础薄弱，经不起理论误导。仔细翻阅他的争鸣文章就可以看出，他着眼的不是概念之争，不是在名词术语上钻牛角尖，而是担心理论失误导致实践受挫，殚精竭虑于追求正确理论对实践的健康指导。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然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杨教同志理论著述的第三个特点是学以致用，有鲜明的针对性。他不是关在书斋里咬文嚼字，热衷于架空设计什么理论体系或创造什么“模式”，而是着重于理论的使用价值，坚信理论的价值在于说明实践与指导实践。他坚持用实践来检验各种理论观点，也用理论观点去解释和指导实践，刻意寻找理论与实践

的耦合点，这正是他选择研究题目时所遵循的原则。举凡他所探讨的大多是实践当中突出存在的问题，是事物发展前沿地带所出现的新矛盾。他的理论著述虽不成系统，但都贯串着与实践密切相关的一根红线，都是以实践为原料加以提炼再在理论上加以重铸的研究成果。把他的理论文章按发表的时间顺序连贯起来阅读，就可以大致看出我国社科情报事业近十几年来来的发展轨迹。

杨教同志 50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入学前当过报社记者，虽然他早已不从事新闻工作，但新闻记者的职业特点在他身上仍清晰可见。他兴趣广泛，知识面宽，对社会问题异常关注，富于激情。这些特点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显现，而在他关于社科情报理论的著述中也略有表露，尤其是一些论战文章往往带有感情色彩，显得不够冷静。对于理论研究，这无疑是一个弱点。但读他的理论著作不觉得呆板枯燥，他那富于哲理的论述中不时闪现激情的火花，耐人寻味。从情报学理论的角度看，杨教同志的著作称不上自成体系的鸿篇巨著，他的某些见解也并非无懈可击，但若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审视，则不难发现他的理论文章都有贴近实践的深刻内容，都与社科情报工作实践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体现出—个情报工作者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的高度历史责任感。收入这本文集中的作品，无论是《实践篇》、《辩论篇》还是《探索篇》，都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其作为“历史痕迹”留存下来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精神田园

——序杨教研究员《敝屣集》

德 万

杨教先生将积年有关社会科学情报的论说篇什汇为一函，书成，未待先生嘱，我欣然秉笔草此以忝列序文之属。此时，我想到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好像我迷了路而向别人问起回家的路一样，有人指给我路并与我一起沿着笔直而平坦的路走去。突然，他停了下来，告诉我：‘现在你必须做的就是从这里找到你回家的路’。”是的，面对盈尺的文稿，我们得“找到回家的路。”我们这些人，由幼及长，漂泊人生，游弋书海，还舞文弄墨，这人生，这事业，路还在不断地延长。这“笔直而平坦”的，或者说崎岖而曲折的路究竟通向何方呢？在人生长途上，我们不停地前行，也有踌躇，也有后退，免不了常常要停下来，怅望前程，回首已往，那家在何处呢？循着这前行的路，我们在探索着真理的昭示，回首那过往的路径，我们可否寻找到那牢实而可资凭藉的精神家园？

读杨教先生的文集，萦回在我脑际的就是这种寻觅中的“回家的路”。目杳杳而路漫漫，真个“云深不知处”。

我与杨教先生比肩共事十有余年，我年龄少先生亦十有余年，问道论学，先生予我为师辈，往还晤对，则大得“平生风义兼师友”的快意。收在这本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距今也十余年了。十余年光阴荏苒，云狗苍茫，回首看斑斑行迹，真不胜唏嘘之感。

我想，这或许是杨教先生将文集命名为《散展集》的缘故吧。

这屡屡墨痕，这雪泥鸿影，这“回家之路”，诚如狄尔泰所言：“意义属于回想和回顾的范畴，人的计划、意向、目的只有在回顾中才能知道哪些实现了，以及它们与周围环境，与别人的计划、意向、目的的关系，所以人只有在事后才能辨明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是在事后才能辨明的，精神的家园不也正是在返乡的路上才能寻见得到的吗？狄尔泰还断言：“个人永远不能认识自己，他永远身在其中。”那么，身在其侧的我，或许能够勘破那波幻影涵的云深之所在吧！就说说我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作为学科建设实肇始于80年代初叶。当其时，四凶谗除，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学术由之而呈现繁荣气象。在此一破一立之间，社会科学情报学萌蘖孕育，出现勃发生机，随后甘霖早甦，几经枯荣，终于嫩苗细枝成长为蓊郁树干。在这一学科生成的历史中，考诸文献，杨教先生文集中首篇《新春畅想录》实为“但开风气”之倡言之作。此文虽以一座谈记录形式，然就社会科学情报这一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言之，举凡学科性质，实践范围，理论目标，队伍构成，学科要素均有纲领性揭橥。在学科萌孕阶段，开辟草莱，指引门径，廓清领域，实在是功不可没，杨教先生与有力焉。1981年至今，已是十余年过去了，文集所载诸文，展卷有示，历历在目，不啻是一幅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科生成发明的运思全景图。从社会科学情报实践中的诸问题到情报理论的范畴、概念、理论主体、逻辑架构及至见诸于《辩论篇》中有关理论争鸣中关于大情报观、独立说及分支说、本分谈、理论属性辨，乃至所谓信息产业，情报商品等等，都有言在论存。在中国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畛域中，仿佛一彪人马，横空出世，左冲右突，驰骋疆场，虽不能说每战必克，攻无不胜，然而那猎猎旌旗，昂然身姿总是那么鲜明地刻印在这过往的学术

历史上。我以为，杨教先生文集行文论辩中透露出的那种本根自植、学域宽博、汰击沧溟的雄浑自在的学术气象，字里行间蕴涵着的那种实事求是、履险若夷、槌幽击危的鲜明独特的学术品格，与社会科学情报学界诸先进之各别的治学路径和学术品尚自当昭引后学。读罢杨教先生文集，不但使人释疑解惑，领略一种学术的魅力与风采，更令人油然而生景行景止，心向往之的钦敬之情。我们每每说及历史与逻辑之统一，捧是书，读是文，自当有所会如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风波》）。藐余小子，本无力对杨教先生之文赞一词，行文至此，设若读者诸君掩卷之余，亦会言曰：是极，是极！

杨教先生绝非趣诡侧危，引矜自诩，炫技埒派之人，文如其人，我信斯言。杨教先生是真正识大体、通大义、明根本、了是非的学人。

马克思说：“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作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在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已经耸然屹立于学术之林的时候，在我们检索学科的生成和发展的历史的时候，在我们回顾情报学科范围内无论具体的文献基础工作还是情报人员队伍构成的创建历程的时候，在我们重读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界诸先进及杨教先生文集的时候，那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过去形式，那凝聚着我们思绪和困惑的精神家园，仿佛天籁的鸣音，那“叩门，就给你开门。”“要光，那里就有了光”，自会在我们的耳际，在我们的心田，轰然而响，声声迫人。

先哲有言：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我说一个人的学问来自于他的做人，一个人的生存方式也正是他的哲学。杨教先生在学问上可称有信有信，在做人上则可谓亦静亦厉。诚如古人所云：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杨

教先生其如是哉。

如今，杨教先生已过耳顺之年，花甲初度，鬓生二毛，先生常语余曰，衰体尚存，困顿如是，然夙志不改，总是怀抱一腔热血，心存那可称理想主义的信念，淳淳然君子风在清简依然的身上愈显得浑厚凝重。与先生交往常令人想起《后汉书·黄宪传》中陈蕃、周举所说的话：“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因而先生或许在精神上常感到寂寥与孤独，然而在人世上则不乏温情与友谊，无怪乎在我们所处的小环境中，就有著名的学者，身居高位的官员，更遑论莘莘学子，引先生为人生上的朋友。

先生何如是也，我以为正是杨教先生的生存历史，正是杨教先生于此种生存历史中超越地表现出的一种生存精神。杨教先生这六十余年的生命历程，这历难经险的生存方式，同我国这辈许多学人是相似的，使我想到古代圣人孔子，所谓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困于陈蔡，庶几乎近也。孔子有“瓠瓜”之叹，有“乘桴”之想，杨教先生不能也。杨教先生15岁投身革命，建国初加入共产党，做工人，当记者，又以勤学苦钻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那场知识分子劫数难逃的天顶之灾中戴帽加冕，社会和历史的玩笑，使得他想作一个无冕之王的职业选择成为就像情感生活上的初恋一样永劫不复，永远只是心灵中依稀的一脉念想。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直到精神重光，日月复明的新时期，杨教先生才用自己的心血，自己的笔墨来浇灌，来描绘这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情报的田园。杨教先生素来尊崇鲁迅，读鲁迅的书，乃至脱口而出鲁迅的话，甚至写字也仿模鲁迅的笔法。我与杨教先生往还，就记忆所及，把盏之间，促膝之余，好像时时都有鲁迅的话题。我常想，余生也晚，不可能亲身体验先生曾遭受的磨难和精神之痛，然而在鲁迅先生这个话题上我们总是相通的。鲁迅夫子，身肩中国文化和中国数千年来

人民之苦难，苦闷彷徨，投枪荷戟，呐喊反诘，同时又温顺贤良，对青年则呵护有加，真正独立寒秋，千年中国之第一人。少年时读鲁迅，只觉隐讳曲折，衷心感到的是文章的气势和学问的博洽。青年时读鲁迅，有正气存乎胸，有是非之明在念念之中。待到年齿徒增，已历验生活的种种况味，再读鲁迅，一卷书如见一个人，一句话犹如说自己，是此青灯烛照，洞察幽明，就有一种心与心的相印，相映！我常想，鲁迅夫子且不说，与他接近的那些时候的那些青年，还有像杨教先生这一辈如今六十余岁的学者，好像在性格上都有几许相近，在人格上都有相互辉映的契合之处。你看，他们梗直爽朗而毫无遮掩，他们朴实无华而资质甚富，他们才情溢然而拙于工计，他们激情而又理智，他们恭训谦和而又急躁偏执，他们有为有不为而又敢于担当。许多时候，许多种情形下，他们似乎并未将环境和对象的差异萦挂心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似乎一点也不顾忌任情挥洒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功利性的不利和恶厄。正是这种个性和品格的难以更移，在人世上，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命定了他们要饮鸩止渴，自醉醉人，因而也命定地要遭受较之常人更多的苦难。杨教先生的生命方式正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呢？

我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出于自己的经历，出于自己的资质，出于自己的品性，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毛病，甚至痼疾，人的处境也会变化，人的地位也会移易，但做人总须有一个准则，“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那圆滑、乖巧、势利、嚣张，这些恶的品性是应该摒弃的，正是这绳直的木，砺利的金，才能守素抱朴，还其人格，因而，这一辈学人即使不幸在身，即使身处捉摸难定的政治风云，即使生活再艰难，即使精神压力再沉重，有了人生的准则就能不至于随波逐流，沆瀣一气而存乎人之浩然之气。同样，

在人性迫于环境，处于最阴暗而又最易于暴露的关头，也就能自然地、清明地，不受任何重压而遭致屈服地表现出自身人格的亮色和光彩。杨教先生的学养正是在自己最为困顿的时期辛勤培壅养育出来，真正“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

我还想，人之有生活准则，人之求善，求真，求美，那内在的，那显乎于身，存乎于心，那体现精神家园的幽渺无形的所在又是什么呢？何前辈学人坚守如斯，杨教先生坚守如斯呢？我想，那或许是直面存在，透悟人生的一种精神体验，正是这种体验形成的一种信念和精神，有着较之生命更为长远的力量。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使得怀抱它的人可能用淡泊的平常心去把握、去创造生活，去迎击风浪，去引吭而歌，响遏行云。那么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使得拥有它的人，任凭风浪起，我自过千滩，任凭还有运动，还有困顿，还有艰难，再也不会经受不起，再也不会承担无力，这精神的力量才真正无坚不摧，这信念的昭示才真正光耀日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杨教先生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要知道以出世心做入世功夫，真不知要受何种数数难尽的磨难啊！可是人生的使命已是不可挣脱了，杨教先生的这部文集正是他于实践中升华，于琐细中探讨，于艰辛中积聚的一笔精神财富。回首那返乡的精神田园，前行的路依然，杨教先生依然。

杨教先生的文集结集出版了，这一学术的运思之路已有了可说是全部的检索凭藉，人生的路还长，还有生活的召唤，杨教先生也还有梦未圆，心未了。然而面对这商品经济的大潮，生活，世界都在变化，杨教先生还是夙志不移，风采依然，不悔不改。物欲愈盛，我愈从容。我想人生的使命已经使得杨教先生难于挣脱，那么，优秀的终归是优秀的，光彩的必然还是光彩的，杨教先生依然。

黑格尔有言：关于世界的思想和看法，总是要待现实已经结束以后才能出现，所以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时刻才会起飞。整整70年前，在玲珑的小雀儿照例到处“唧唧啾啾”叫，轻飘飘地跳的时代，鲁迅夫子曾发出这样的呐喊：“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惊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哪里！？”

真的“恶声”在哪里呢？

在我相伴着杨教先生返乡寻觅那精神家园的此刻，我想，那黄昏的景色已经来临，期待那密纳发的猫头鹰能够飞起来，杨教先生的文集正是他的哲学，他的人生。

是为序。

自序

在一次全国社科情报理论讨论会上，由于讨论的问题涉及我发表的文字，有人建议我汇集成册供研究者参考，我未曾动心，理由很简单：拿不出手。文化界有所谓“良工不示人以朴”和“良工示人以朴”之议，我非“良工”，自然不在所议范围之内。这点自知之明，我是有的。

后来我写的这类文字多起来了，而且常常由于我的胡说引起争议，也有过出集子的念头，但想了想，终于作罢。这种“想了想”，对人对己，都有一点嘲弄意味。这些年，学术论著出得不少，其中不乏佳作，但人云亦云敷衍成章者时亦有之，有的甚至是为了适应某种不是从科学本身，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的需要才编来出版的，一旦这种“需要”过时，这种“论著”也随之过时，枉然留下一堆既无人说好、也无人说坏的“文字垃圾”，很难说有什么用。——也许有点用吧，那就是可以用来评职称，糊弄那种只看本本堆头、不看或没有时间看内容的评委、学术委员先生们。我离开北京到湖北工作前，一位颇有名气的哲学教授善意地劝我集中精力搞专著，说这是出成果的有效办法。对此，我是感激的，也曾“想了想”，但始终未能照此办理，一是我觉得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很多，容不得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去搞什么专著；二是我觉得一部专著本身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体系，有如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它的每个构成部分都是精美的，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而我看到的“专著”，有的表面一片金碧辉煌，囊里却塞满粪土朽木，为了“体系”